

哲学与文明

的

当代视野

贺祥林 著

南海出版公司

湖北省重点学科基金资助出版

哲学与文明的当代视野

贺祥林 著

南海出版公司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哲学与文明的当代视野/贺祥林著. —海口:南海出版公司, 2002. 3

ISBN 7 - 5442 - 2078 - 8

I. 哲... II. 贺... III. 哲学—文集 IV. B—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06858 号

ZHUXUE YU WENMING DE DANGDAI SHIYE
哲 学 与 文 明 的 当 代 视 野

作 者	贺祥林
责任编辑	周诗鸿
特约编辑	张光华
封面设计	李 钢
出版发行	南海出版公司 电话(0898)65350227
社 址	海口市机场路友利园大厦 B 座 3 楼 邮编 570203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武汉理工大学印刷厂
开 本	850 × 1168 1/32
印 张	13.5
字 数	321 千
版 次	2002 年 3 月第 1 版 2002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 ~ 1000 册
书 号	ISBN 7 - 5442 - 2078 - 8/B·22
定 价	26.00 元

南海版图书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自序

1

读者触摸到的这部书,其所以取名《哲学与文明的当代视野》,缘由有三:其一是本书第一至第七章是探索与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若干原著与原理的,包括第十二章《论西方哲学》也是以马克思主义哲学观点和方法来入思与行文的;其二是本书第八至第十一章是探索与研究马克思主义社会文明理论的,其中有三章是关于制度文明理论的专论,有一章是关于精神文明中思想建设的专论,总体上主张“三个文明”一并提是马克思主义社会文明观的应有思路;其三是本书为本人已经或尚未发表的70余篇论文中选出的40余篇论文,它们是20世纪80年代中期直至21世纪头一年陆续写成的,而且都是对当代视野下的哲学与文明诸问题的思索,并自认为具有较强烈的当代性与针对性。当然,这些论文收入本书时,大多数篇章都进行了增删修改与技术性处理,有些论文还增添了副标题和文中小标题,书中十二个章节分别是以3篇以上自成一体的相对独立的论文组为一个章节编排而成的。

如果读者先翻阅一下列在首篇的《略论哲学的社会功能》这一短文——亦可称作全书的引论,就可以明了我在该文中的想法与全书之神通,这无非是主张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是要关注与反映社会文明的实践并指导与推动社会文明演进的实践。这部书虽然不是按现在的章节顺序逐步写成的在微观上都有内在联系的连续性专著,但是它们在宏观上存有一些相伴相映、相辅相成的东西。我在思考并写作这些论文的心路历程中,一方面是把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方法论与历史观等哲学意味串进了社会文明理论的研究领地,以至于探讨了制度文明连同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一并整体

式纳入历史唯物主义范畴体系的问题,探讨了“三个文明”的辩证关系问题,提出并初步研究了邓小平社会主义制度文明建设思想这个课题,提出并阐发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质上就是社会主义“三个文明”建设的思想。另一方面是在对社会文明理论作深入一步的研究时,发现无论是社会文明立论的基点与基本方面的划分,或是其建设途径与具体内容的演进,都离不开人的实践,从而使自己领悟到如果没有对实践的理解就无法掌握历史唯物主义,进而有了历史唯物主义实质上就是实践的历史唯物主义的认知,并将这个思路反射到对全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解,作出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确切表述应当是还其创始人关于“实践的唯物主义”的提法,这是自觉而郑重的选择。说起对实践的唯物主义的认知选择与对制度文明理论的执意求索,其中都有着令我终生难忘的思想情节,我想借这“自序”之机一吐为快!

2

关于对实践的唯物主义的认知选择,有一些或近或远的思想情节。1992—1993 学年度,我有幸到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做我国著名马克思主义哲学家肖前教授指导下的国内访问学者,我当时带去了关于“制度文明基础理论研究”的课题,并且得到了肖老师的热情支持与悉心指导。但是,就实践的唯物主义而言,我早知肖老师在 1983 年就提出“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实践的唯物主义”,认为:“马克思和恩格斯把自己的哲学称为‘实践的唯物主义’,这说明,实践的观点不仅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首要和基本的观点,而且是包括唯物史观在内的全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首要和基本的观点。”^① 而在 80 年代后期,肖老师和他在中国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的同事与学生对此又作了深入一步的研究,并推动了全国范围

^① 肖前:《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实践的唯物主义》,载《东岳论丛》1983 年第 2 期;《理论联系实际——谈〈实践论〉札记》,载《社会科学战线》1983 年第 3 期。

关于实践的唯物主义的讨论。我当时在肖老师门下做访问学者时,对将马克思主义哲学表述为实践的唯物主义不仅没有去“盲从”,反倒是不以为然,那时仍旧主张,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表述比较贴切。所以,那时在肖老师面前只好避其所难,交谈中总是不离制度文明或者别的问题,彼此都只言未提实践的唯物主义问题。

然而,这个思想情节在 1996 年发生了转变。应当说收入本书第二章的四篇论文和第三章后三篇论文是我在此前认定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是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框架内所作的理论探讨。而我的这个转变,就发生在这年暑假,是在武汉这座著名“火炉”汗流浹背地重读马克思《经济学——哲学手稿》(刘丕坤译本)、《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和马克思恩格斯合著的《德意志意识形态》第一卷第一章来完成的,其标志是写成了收入本书第一章的《实践释义与实践的唯物主义》这篇论文。还有收入本书第三章的第一篇论文和第四章的四篇论文等,都是我对实践的唯物主义的一些零星的初步的研究,而收入本书的第八至第十一章,不管是 1996 年之前或之后所写成,都可将它们视为对实践的唯物主义的社会主义文明理论所作的基础性或应用性的初步研究。当然,我们决不能把过去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解释内容给以全面否定,我在《实践释义与实践的唯物主义》一文中表明态度是:“既然,‘实践的唯物主义’是按马克思主义哲学本来的内容和内在的要求来复现其自身、来正本清源,于是就存在一个以实践的唯物主义来主导与总揽,并对过去体系结构中的基本内容给予扬弃,进而把它们有机归属到实践的唯物主义体系结构中的问题。”(见本书第 11 页)时至今天,我可以说,收入本书第二章的前三篇论文都只是对列宁给出的辩证唯物主义物质定义作解说作论证,并选择了能代表列宁思想的“物质是指不依赖于人的意识并且为人的意识所反映的客观实在”这个定义。但是,作为实践的唯物主义的物质定义,就应

当是对前者作扬弃的基础上有所创新,这就得把实践放置于物质定义之中,由此来界定实践的唯物主义的“物”应当是什么。我在此试作的界定是:物质是指不依赖于人的意识而存在又能为人在实践中能动地认识和改造的客观实在。不难看出,这个实践的唯物主义的物质定义,仍然是以确认“外部自然界的优先地位”或自然界的先在性为前提的。在这个前提之下和在这个实践的唯物主义的物质定义之上,作为实践的唯物主义者,我们还有很多问题需要讨论再讨论。

3

关于对制度文明理论的执意求索,有着更多的令人刻骨铭心的思想情节。先要谈的一段思想情节始于1982年末,当我读到胡耀邦同志在党的十二大报告中关于社会文明的那段著名论述时,我不仅仅为报告从实践的基点上科学地界定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这两个文明范畴及其主要表现内容而称快叫好,还注意到报告同时指出:“改造社会的成果是新的生产关系和新的社会政治制度的建立和发展”,“社会的改造,社会制度的进步,最终都将表现为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发展。”^①这两点论述特别引人思考、催人研讨。当我再去研读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年9月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社会主义文明》时,我把马克思恩格斯的有关论述同我党报告中的上列论述,作了一番比照与阵阵沉思,顿时一道思想的闪电在我脑际炸响,“制度文明”这个范畴便脱口而出。翌年春暖花开的时节,《论制度文明》一文在我手中脱稿。未曾想到的是,我从1983年初到1985年底这3年时间里,先后将这篇文稿抄寄到大江南北十几家刊物,竟没有一家刊物愿用或敢用,几家刊物在退稿便条上给我的回复,大多是“大作已拜读,因考虑其作

^① 《十二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第26页,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在两个文明之外,再提一个制度文明,这与当前党中央的提法不太一致,故此不宜采用”之类的文字。1986年,这可是我兴奋之事接踵而来的年份,我当时正就读于陕西师范大学哲学助教进修班,在导师们开设的十几门硕士研究生主要课程中,有一门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研究”,由时任陕西师范大学政教系主任的刘修水教授讲授,我在3月中旬将《论制度文明》一文稍作修改,作为课程论文送导师指导,没想到刘老师是对我这篇论文第一个给予认同的人,并且给出了96分的高分。接下来是3月下旬某日,我在该校图书馆期刊阅览室惊喜地读到《河北学刊》1985年第6期上刊发的《论社会主义文明的三维结构》一文,作者是云南省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苗启明研究员,这是一篇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制度文明一并提并且是我国公开发表的第一篇研究制度文明的专文。此时的我心对我说,终归有刊物敢为制度文明的研究提供园地了。兴奋之余,我当天就把《论制度文明》一文抄寄到《河北学刊》,4月收到采用通知,5月该刊在1986年第3期首篇刊发此文,这也是我有生以来在公开刊物上发表的第一篇论文。这篇东西尽管今天看起来有些粗浅,以致收入本书时又作了一点删削,但在当时一经发表便得到多份刊物转载、报纸摘要介绍与学者引证。

4

接着要谈的一段思想情节始于我在肖前教授指导下的专事制度文明研究之时,在1992—1993学年里,我虽然只完成了收入本书第八章的《制度文明应纳入历史唯物主义的范畴体系》一文和《时代精神·唯物史观·制度文明》的初稿、第九章的《再论社会文明第三个基本方面的科学称谓》一文和第十章的《论邓小平关于制度文明建设目标的思想》的初稿,但是从肖老师那里得到的教益则是多方面的。在一次师生间的侃侃而谈中,肖老师对我讲,你研究制度文明,恐怕民主与法制应当是考虑之列的一个问题。你应注意

邓小平同志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一文中讲到毛主席说斯大林破坏法制的一段文字。后经查阅,邓小平同志是这么讲的:“我们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这些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即使像毛泽东同志这样伟大的人物,也受到一些不好的制度的严重影响,以至对党对国家对他个人都造成了很大的不幸。我们今天再不健全社会主义制度,人们就会说,为什么资本主义制度所能解决的一些问题,社会主义制度反而不能解决呢?这种比较方法虽然不全面,但是我们不能因此而不加以重视。斯大林严重破坏社会主义法制,毛泽东同志就说过,这样的事件在英、法、美这样的西方国家不可能发生。他虽然认识到这一点,但是由于没有在实际中解决领导制度问题以及其他一些原因,仍然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这个教训是极其深刻的。不是说个人没有责任,而是说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这种制度问题,关系到党和国家是否改变颜色,必须引起全党的高度重视。”^①我当时感到,民主与法制的理论与实践,民主与法制的形式与内容,治党、治国是实行人治还是应当实行法治,这都是与制度文明密切相关的重大问题。我在后来的进一步认识是:“我们对法治建设不满足只将其归之为制度文明建设的内容范例,就其地位与作用而言,无论是从实践上或是从理论上,它应提升为制度文明建设的一个核心向面,它同民主建设这个制度文明建设的又一个核心向面共同构成制度文明建设的辩证统一的整合性核心。人类古往今来的实践经验告诉我们,没有民主的法治是不健全的法治,以皇帝、国王之言定法律或专制就是如此,同样,没有法治的民主是无保障的民主,以不负法律责

^① 《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33页,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任、不经过司法程序、名之曰‘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形式出现的所谓‘大民主’就是如此。我国进入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以来,对于没有社会主义民主也就没有社会主义法治和没有社会主义法治也同样没有社会主义民主,其民主与法治是辩证统一、不可分离等道理,人们已由原初的生疏到逐步熟知并正步入真知的思维境地。”(见本书第343-344页)还有一次同肖老师的交谈中,他对我讲,邓小平同志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夜作的著名报告和他1992年在南方发表的重要谈话,那里面制度文明建设的思想值得研究一下。正是在肖老师的这个启示之下,我后来拟出了“邓小平社会主义制度文明建设思想研究”这个课题,并申报批准为湖北省社会科学基金“九五”重点项目,其最终研究成果收入本书的主要有第十章的后四篇论文和第七章的后两篇论文,这其中就包括我对肖老师提到的邓小平同志那两篇著作(后来被我党称为新时期的两篇宣言书)的学习体会。

5

再要谈的一段思想情节为我对社会文明第三个基本方面的科学称谓的争辩及其思想共鸣。在确认社会文明应当是三维的或三个基本方面的共识下,在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之外,再提社会文明第三个基本方面,其称谓应当是什么?何种称谓才是科学的?学者们众说纷纭,主要有制度文明论与政治文明论之争,还有体制文明和行为文明两个提法。我一向认为只有制度文明才是社会文明第三个基本方面的唯一科学的称谓。我在写《论制度文明》一文之前,曾对党的十二大报告关于制度的两点论述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社会主义文明》中马克思的有关论述作比照时,注意到马克思在1844年底写的《关于现代国家的著作的计划草稿》中提

出过“政治文明”的范畴。^①我那时感到,如果把人类改造社会的成果仅仅归结为政治文明,其内涵与外延就显得狭小一些,而从理论上以及被实践证明,把人类改造社会的成果上升为制度文明,其内涵与外延就宽阔深刻得多,以至它本身包容着政治文明的内容。所以在比照与沉思之后,我没有选用马克思的提法,也就是没有照本本来或“以本为是”,而是采用党的十二大报告的思路,也就是今天所说的与时俱进或“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路,从而提出了制度文明的范畴。对此,读者可以去看看收入本书第九章“与钱学森等同志商榷”一文,特别是其中的第四目即“怎样看待马克思提出的‘政治文明’范畴”,还有本章“与金东珠同志商榷”、“与高金顶同志商榷”两文,这分别是同主张把政治文明、体制文明、行为文明作为社会文明第三个基本方面的称谓的同志进行的讨论与争鸣。在探讨制度文明之途,我不得不说同王梦奎同志在1996年春夏之交的一番强烈的思想共鸣。中共中央委员、时任国务院研究室主任(现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任)的王梦奎同志,他在1996年初发表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纲》一文末尾讲到:“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目标是什么,包括哪些内容,人们有一个认识过程,‘楼上楼下、电灯电话’,‘犁地不用牛,点灯不用油’,这是解放初农民对于未来社会主义幸福生活的向往。‘四个现代化’(工业、农业、科技、国防)的提法,见之于党和国家的正式文献,起过很好的作用。现在看来,这个提法不足以概括现代化的全部内容,它偏重于经济,但却未包括生产和流通相统一的经济的流通领域,更没有包括全部精神文明。两个文明建设(即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的概括)大大前进了一步,但似乎仍未能概括现代化的全部内容。……我认为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目标似乎可以概括为三个组成部分:物质文明建设——现代化的经济;精神文明建

^①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社会主义文明》,第63页,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年版。

——现代化的科技、教育、文化，以及适应现代经济与现代科学文化的思想道德；制度文明建设，……与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相适应的各方面比较完善和成熟的制度。”^① 在拜读这篇长文特别是这段精当论说的当晚，我给王梦奎同志写了一封短信，信中表白了对这位高层领导兼高层学者见解的敬佩，也谈到我研究制度文明理论的体会及困难，特别谈到的是敬请王梦奎同志能向党和国家最高决策层建议采纳“三个文明”一起抓的提法，并附寄上了我已定稿半年的《论社会主义三个文明的战略地位及其辩证关系》一文，即为收入本书第十章的第三篇论文。此文实际上是我在学习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和《邓小平文选》基础上的体会或某种理论上逻辑上的重构。文中先后引述了叶剑英同志于1979年9月29日《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三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邓小平同志于1979年10月30日《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的祝辞》、党的十二大报告、党的十二届六中全会决议中关于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内容与社会文明的内容的论述，这些论述记载着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向全党全国人民表达了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内容就是社会主义三个文明建设的内容的鲜明思路（参见本书第299—302页）。我没有想到，身处繁忙之中的王梦奎同志于1996年4月8日亲笔给我回了信，他在信中一开头就讲到：“关于制度文明建设，我做了多年‘口头文学’，去年正式写成文章，最初也是一次报告。囿于见闻，过去未能见到您的文章，至今亦未得拜读。这个问题，就我所接触到的理论界及其他方面的同志，并无不同意见。中央关于改革开放的一系列文件，实际上已经明确指出了制度文明建设的问题，只是未用‘文明’二字而已。十多年来的改革开放，就是在进行制度文明建设的实践即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未提

^① 王梦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纲》，载《中国社会科学》1996年第1期。

制度文明,并不影响改革开放的进行,只是在理论上如何表达的问题。至于中央文件如何表达,则还需要考虑如何准确界定,以及干部群众易于接受而又不致产生误解。所以,考虑再三,我的意见还是先在学术性刊物上发表。”读完这封言简意赅的信,不仅对我从事制度文明理论研究增添了强大的信心并注进了新的精神底气,而且透视了党政高层对确认制度文明为社会文明第三个基本方面的科学称谓“并无不同意见”,特别是看到党的最高决策层有采纳“三个文明”建设一并提的可能性,“只是在理论上如何表达的问题”。在我和王梦奎同志的这段神交之后,我们欣喜地看到,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继承并发展了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的上述鲜明思路。这首先反映在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四大与十五大的两个报告中,他先后指出:“要围绕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和精神文明建设,促进社会全面进步。”^①“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二十一世纪。”就是要“围绕经济建设这个中心,经济体制改革要有新的突破,政治体制改革要继续深入,精神文明建设要切实加强,各个方面相互配合,实现经济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②江泽民同志的这两次论述被理论界有些同志称之为“社会全面进步的理论”,我认为这个社会全面进步的内容就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全面内容,也就是社会主义社会文明建设的全面内容,其中两次提到的“围绕经济建设这个中心”无疑可归结为物质文明建设,两次提到的“精神文明建设”不言自明,而两次先后提到的“民主法制”建设和“经济体制改革”与“政治体制改革”是分别侧重制度文明建设的整合性核心和制度文明建

^① 江泽民:《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第19-20页,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

^② 江泽民:《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第1页,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设的突出任务而言的。其次反映在江泽民同志自 1996 年以来反复强调的“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的思想及其具体展开中,他于 2000 年 6 月指出:“创新,包括理论创新、体制创新、科技创新”,^①《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八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进一步指出:“‘三个代表’要求,是我们党的立党之本、执政之基、力量之源,也是我们在新世纪全面推进党的建设,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制度创新和科技创新,不断夺取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胜利的根本要求。”^②江泽民同志的这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讲话,把“理论创新、制度创新、科技创新”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并列以至结合起来,如果说这“三大创新”的主要内容分别是与精神文明、制度文明、物质文明相对应的话,那么我认为把“三大创新”都搞好或搞上去,就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全面胜利,就是社会主义三个文明建设在中国的全面胜利。我们主张制度文明是社会文明第三个基本方面的科学称谓的学者,日夜向往与热切期望的是,党和国家最高决策层,能尽可能早一点地将物质文明建设、制度文明建设、精神文明建设一并提,并以此方针来指导“三个文明”建设的实践,特别是要加速制度文明建设的步伐,以此来保证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的健康发展。

贺祥林

二〇〇一年农历十一月十七日

于武昌沙湖琴园

^① 江泽民:《论科学技术》,第 199 页,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1 年 1 月版。

^② 江泽民:《论“三个代表”》,第 153 页,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1 年 8 月版。

目 录

自序	1
第一章 论哲学基点问题	1
一、略论哲学的社会功能	1
二、实践释义与实践的唯物主义	4
三、论掌握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根本方法	14
第二章 论物质及其运动	21
一、列宁的两个物质定义的逻辑解析	21
二、再论列宁的两个物质定义 ——答周久义同志	30
三、三论列宁的两个物质定义	38
四、论思维运动是物质运动的基本形式及其多重意义	42
第三章 论辩证法与认识论	53
一、从一总三分的视角掌握《自然辩证法》	53
二、偶然性是“可以不出现”的东西吗	70
三、马克思主义认识源泉观新探	72
四、试谈真理的定义	80
第四章 论实践与唯物史观	87
一、关于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思考	87
二、略论马克思社会有机体理论的构成内容	99
三、在实践基点上全面辩证地掌握国家的本质	104

四、论领袖、政党、阶级、群众的辩证关系 ——列宁思想与邓小平思想比较研究	121
第五章 论实事求是	141
一、论《反对本本主义》的精华(A) ——实事求是、自以为是、以本为是思想之分野	141
二、论《反对本本主义》的精华(B) ——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思想之共生	156
三、论指导社会主义建设的思想路线 ——列宁思想与邓小平思想比较研究	161
四、实事求是·初级阶段·基本国情	177
第六章 论生产力	181
一、宏阔视野下的马克思主义生产力概念系统	181
二、精神文明是否生产力之探讨 ——与张金根同志商榷	189
三、论邓小平“三个有利于”判断标准问题	197
第七章 论经济哲学	204
一、毛泽东《论十大关系》创见三题	204
二、两种市场经济体制源流之反思	212
三、选择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哲学思考	222
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制度性思考	230
第八章 论制度文明(上)	238
一、论制度文明	238
二、制度文明应纳入历史唯物主义的范畴体系	245
三、时代精神·唯物史观·制度文明	258

第九章 论制度文明(中)	265
一、论社会文明第三个基本方面的科学称谓 ——与钱学森等同志商榷	265
二、再论社会文明第三个基本方面的科学称谓 ——与金东珠同志商榷	273
三、三论社会文明第三个基本方面的科学称谓 ——与高金顶同志商榷	282
第十章 论制度文明(下)	288
一、社会主义制度文明初议	288
二、从制度文明建设的角度看坚持两个基本点	293
三、论社会主义三个文明的战略地位及其辩证关系	299
四、《共产党宣言》中的制度文明思想及其对当代世界 的启示	309
五、邓小平制度文明建设理论的开拓之篇 ——读《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 的体会	324
六、论邓小平关于制度文明建设目标的思想 ——读《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谈话要点》 的体会	330
第十一章 论精神文明	335
一、论精神文明建设的三种思路与相关问题	335
二、关于意识形态领域指导思想的若干问题	346
三、论掌握爱国主义的若干方法与基本内容 ——列宁思想与邓小平思想比较研究	360